



鲁迅作品选讲

LU XUN ZUO PIN XUAN JIANG

甘肃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鲁迅作品选讲

上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一九七七年九月

目 录

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	(1)
狂人日记	(80)
药	(100)
故乡	(113)
阿Q正传	(127)
祝福	(179)
在酒楼上	(201)
理水	(21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39)
藤野先生	(248)
秋夜	(262)
这样的战士	(266)
自题小像	(270)
湘灵歌	(273)
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	(277)
自嘲	(280)
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	(285)
亥年残秋偶作	(288)

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

一、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姓周，名树人，字豫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县）。“鲁迅”，是他从一九一八年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

伟大的人物是由时代造就的，是由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乳汁哺育成长的。一八四〇年，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面貌，继续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他们用重炮打败了古老的封建中国的清朝政府。此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西方资产阶级为了疯狂地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不断发动侵华战争。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接受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
一八四三年，中美望厦条约；
一八四四年，中法黄埔条约；
一八五八年，中俄璦琿条约；
一八六〇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

这些条约，如利刃宰割着中国的肢体，如吸血管吮吸着中国的膏血，

如磐石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阴险狡猾的沙皇俄国，不仅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片领土，仅一八五八年，它趁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不发一兵，不费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而且，超越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国大片的领土。清朝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把中国推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蒙受着深重的灾难。

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有压迫，就有反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精神。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列宁的号召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革命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伟大的鲁迅，就是由这种伟大的革命斗争时代造就的，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鲁迅先生》）

鲁迅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周致福（后改名福清），号介孚，出宰过江西金溪县，任过“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号伯宜，是读书人，中过秀才。母亲鲁瑞，出身农家，“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鲁迅童年时，

家有四、五十亩水田，不愁生计。一八九三年，他祖父因科场作弊，被捕下狱，接着父亲又重病卧床。鲁迅的家就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这种变故，使他遭受了寄居亲戚家而被人“称为乞食者”的辛酸，拿衣物首饰去典当而受商人的侮蔑。这种生活经历，使少年的鲁迅“明白了许多事情”，“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一八九八年春，十八岁的鲁迅接过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元旅费，“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离开故乡，前往南京。五月入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改入陆师矿路学堂。在南京学习四年，“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朝花夕拾·琐记》）但在此期间，鲁迅开始接触了“新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今译本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这部书，总的说来，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从此，鲁迅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它作为思想武器，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百日维新”的流产，洋务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使鲁迅深深感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帝国主义的凶残暴虐，因而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一九〇二年春，鲁迅怀着追求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在此期间，鲁迅积极参加当时在东京的各种革命活动。后来鲁迅写道：“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一九〇四年九月，鲁迅怀着科学救国的幻想，离开东京，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業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

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不久，严酷的现实击碎了鲁迅美丽的梦想。那时，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结束不久，学校当局常在课间放映一些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战胜沙皇俄国的纪录影片。一次，鲁迅在画面上看到，一个据说是给沙皇军队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绑着，正要砍头示众，而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一回对鲁迅刺激极大，他深切地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于是决定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把文艺作为唤醒人民的工具。当时，鲁迅还没有认识到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的根本途径是革命的实践。

一九〇六年春，鲁迅从仙台到东京，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文艺活动。他计划创办《新生》杂志，因人员和资金不足而流产。接着，他就着重翻译和介绍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把文艺活动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用文艺作工具去唤醒人民起来斗争；在此同时，鲁迅积极投身于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反对封建复古派、洋务派、改良派的革命斗争的洪流，并于一九〇八年，经章太炎介绍，参加革命团体“光复会”。在此期间，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闪烁着鲁迅坚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精神，是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其中也有受尼采的“超人”哲学的思想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

一九〇九年夏，鲁迅离开日本，返回祖国。起初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和生理教员。一九一〇年秋，任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兼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后，鲁迅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进行宣传活 动，组织武装演说队，扩大革命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赶走了，结束了封建帝制，但是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月八日》 影小海白前“国家” 敬清 的

一九一二年二月，应蔡元培的邀请，鲁迅离开绍兴去南京，任教育部部员。五月，随教育部去北京，任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后任金事。鲁迅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了中国的民主革命，造成了“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严酷现实，人民群众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鲁迅既痛心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又因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到来而看不见革命的出路，因而陷入了寂寞和苦闷之中。五四运动前的一段时间里，鲁迅在读古书、抄古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上消磨大量的时光。他在寂寞中冷静地思考，在苦闷里艰难地探索。虽然没有青年时候那样慷慨激昂，但思想磨炼得更深刻了。在读古书时，联系“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的现实，认识到封建主义吃人的反动本质，剥削阶级残害人民的种种鬼蜮伎俩，更加觉悟到“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当时的先进分子提倡民主和科学，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反对专制，反对迷信；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矛头直指维护封建主义的孔学。一九一七年一月，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痛斥孔丘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指出将孔教载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一九一七年冬，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胜利了。这使在寂寞和苦闷中的鲁迅看到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新希望，给了鲁迅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促使鲁迅从寂寞和苦闷里振奋起来，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将令”，在文化战线上，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鲁迅·集附

一九一八年初，鲁迅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五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直捣“孔家店”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革命思想之深刻，对封建主义抨击之猛烈，批判之彻底，是空前未有的。它既是在文化战线上过去反封建的总结，又指明了日后反封建斗争的方向。接着，鲁迅又写了一系列的杂文和小说，彻底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深刻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为迎接五四运动的到来，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毛主席在湖南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组织 and 领导各阶层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了“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鲁迅发表杂文严正驳斥反动势力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诬蔑，热情赞颂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下的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在斗争的实践中，鲁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开始从进化论向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过渡。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伟大作用：“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热风·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认识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鲁迅书信集》上卷第一八页）；认识到破与立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热风·随感录四十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三闲集·通信》）。当然，鲁迅这时思想上的进化论的成分还是很大的，还有待于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改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向前发展了，深入了。新文化运动的统

一战线发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从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投靠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队伍，持消极态度；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当时的实际的革命活动。鲁迅看到《新青年》的团体散掉，“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但是，新的战友在哪里？正确的道路是什么？鲁迅暂时还找不到答案，有时不免有孤独寂寞的感觉。但是，他仍然紧握手中的武器，坚持战斗；在战斗中开拓前进的道路，在斗争中寻求自己的战友。鲁迅用他那钢刀似的笔，批判胡适掀起的所谓“整理国故”的逆流，批判徐志摩、陈西滢一伙“现代评论”派的复古倒退的主张，批判章士钊一伙“甲寅”派提倡的“读经救国”的谬论，批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并且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报纸上传出的段祺瑞政府的第二批“通缉”名单里，就有鲁迅，但是，鲁迅仍然无所畏惧，坚持战斗。

中国共产党帮助了在绝望里的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胜利地领导着全国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在革命形势的推动和鼓舞下，鲁迅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应邀前往厦门大学任国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厦门大学的情况使鲁迅很失望。一九二七年初，鲁迅离开厦门，怀着“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和“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两地书·六九》）高昂的革命激情，奔赴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发展，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成分越来越多。他从汹涌澎湃的工农运动中，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看到了工农群众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力，认识到“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坟·写在〈坟〉后面》）；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人类社会，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

自然比先前抬了头”，而且指出：“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集外集拾遗·〈争自由的波浪〉小引》），认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两地书·一〇》），“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才能加以改造，一分为二地看待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华盖集·导师》），对某些比老年更恶劣的青年，“也不再留情面”（《两地书·七九》）。如果说《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思想深刻的杂文，已处处散发着阶级斗争气息，那么，《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则更进了一步，直接引用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的教导，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了。凡此种种，说明鲁迅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已由量的积累达到了实现质的飞跃的前夜，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飞跃的前夜。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在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纵容下，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各地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对此，鲁迅感到无比愤怒，挺身而出，积极营救在广州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无效，鲁迅愤然辞去他在中山大学担任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鲁迅在极其艰苦危险的处境中，满腔怒火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横加给革命者的种种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概括之，曰：可恶罪。”（《而已集·可恶罪》）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鲁迅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而英勇牺牲，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剥削阶级的一己的私利而把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的反革命罪行，“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残酷的鲜血淋漓的阶级斗争的事实，使鲁迅彻底抛弃了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毛主席在湖南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十月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于九月离开广州，十月初到达上海。选择了当时中国文化斗争的中心上海作为基地，配合农村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并在这一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是偶然的，是由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的，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不是唯恐烧着自己一根毫毛而小心翼翼的庸人，而是伟大的革命家。“五四”时期，他在新文化的革命策源地北京，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而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大革命高潮中，他战斗在当时革命的中心，大声疾呼，“进击”，“进击”，“永远进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同国内外党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韧性战斗，是革命实践使他在战斗中成长，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主观世界。

斗争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鲁迅进行战斗。鲁迅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在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从一九二〇年前后，鲁迅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著作。到上海之后，开始系统地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据《鲁迅日记》，仅一九二八年就购买了六十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看这方面的著作”（许广平：《欣慰的纪念》），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鲁迅，对于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一经学会了马列主义，就运用它来分析他所接触的各种实际问题，全心全意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击形形色色的敌人，同时，

也“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因此，共产主义者鲁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哺育成长起来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鲁迅极其注重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因为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而同那种“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人们根本对立。正是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推动着鲁迅抛弃“科学救国”的梦想，克服“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排除思想上的“毒气和鬼气”（《鲁迅书信集》上卷第六一页），攀登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峰。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新民主主义论》）。鲁迅在这一时期坚持文化革命深入，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渡过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一九二八年，鲁迅认真地系统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评创造社和太阳社在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的错误。一九三〇年二月发起和组织文化界的进步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三月发起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三年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和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鲁迅满怀革命的情谊致电热烈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一九三六年，鲁迅坚决反对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批判“国防文学”口号的错误，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捍卫无产

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大量的杂文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结晶，内容丰富，深刻有力，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可贵的是，愈到晚年，鲁迅的革命斗志愈坚，革命干劲愈大。在险恶的环境中，紧张的战斗和繁重的工作，极大地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严重的肺病日益恶化。但是，鲁迅想到的只是为革命“要赶快做”（《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革命加拚命，夜以继日地拚命干革命。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写讫”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旧诗、小说和翻译等还不在此数之内。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日夜发烧，痰中带血，体重仅八十五点八磅“而肋膜间尚有积水”（《鲁迅日记》下卷第一〇一八页），仍然忘我地战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著名的、公开声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文章，就是在这时卧床依枕夜以继日地写成的。直到逝世的前一天，鲁迅还未放下他手里的战笔。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五时二十五分，中国文化战线上一颗明亮的智慧的巨星陨落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五十六岁。

鲁迅的逝世，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唁电中说：“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战友，而同声哀悼。”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五时二十五分，中国文化战线上一颗明亮的智慧的巨星陨落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五十六岁。

二、鲁迅的小说

又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鲁迅共创作小说三十四篇，编为三个集子，即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的《呐喊》，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的《彷徨》，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鲁迅“文学是战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为的是紧密配合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任务服务。这些小说，以其思想内容的深刻、艺术形式的新颖，战斗性之强烈，社会影响之广泛，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珍品，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灿烂明珠。

1. 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是造成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腐朽不堪的封建主义，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只有打倒封建主义，中国人民才能抬起头来，中国社会才能向前发展。为此一九一八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它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品。

《狂人日记》的鲜明的强烈的反封建的倾向性，是通过“狂人”的日记表现出来的。“狂人”是寻求真理要求改革而被迫害成狂人的战士。因此，他原来的清醒的认识在“迫害狂”的病态中仍有显

现。狂言里渗透着清醒的分析，而清醒的深刻的认识又具有狂的表现形式。通过这种特别的艺术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思想，深深地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里指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历史的每一进步，都是由劳动群众的血泪和白骨造成的。《狂人日记》彻底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明史就是“吃人”史，即反动统治阶级用软软硬硬的方式吞噬劳动人民的历史。鲁迅对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对中国的社会进行了多年的冷静的科学分析，发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鲁迅书信集》上卷第一八页）。剥削阶级在现实生活中在实际行动上“吃人”，但口里却要讲“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的说教把鲜血淋漓的吃人真相掩盖起来，这就是封建主义的反动实质。《狂人日记》用艺术形象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本质。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封建阶级要“吃人”，必然要施展种种鬼蜮伎俩，制造“吃人有理”的谬论。为了残害人民而又显得“名正言顺”，总是给被压迫人民横扣上“贼”、“匪”、“盗”、“寇”等帽子。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巧立名目以杀害人民，正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老谱！

《狂人日记》除揭露封建阶级用涂上“仁义道德”的钢刀杀人之外，还揭露了他们用软刀子杀人的罪恶，这把软刀子就是封建礼教。他们在宣扬封建礼教时，“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这帮家伙具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肯肯几下。

所谓“逼”，就是从精神上逼迫、虐杀，磨消被压迫人民的一切革命思想，使劳动人民变成会说话的工具，供他们役使。历代封建法律明文规定：有乖纲常，干犯名教者，杀！凡所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被定为杀无赦的“十恶”。特别是妇女受三纲五常的名教迫害最深，强制她们遵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要一而终。如果一旦死了丈夫，就只有死路一条，再嫁就叫做“失节”，而为社会所不容；“守节”则不免饿死。封建阶级的所谓“纲常”之“理”，是血案中而不带血迹的杀人工具，其毒辣残酷，是语言难以形容的。两千多年来，死于钢刀下者，固然不计其数，死于软刀下的人民又何止千千万万！《狂人日记》正是对于这种历史事实的形象概括。

《狂人日记》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是鲁迅的根本思想。这种根本的思想，不是短暂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从时代的潮流中吸起来的，是持久的。后来鲁迅的许多小说就是从这个根本思想出发，对“吃人”的封建主义从各方面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深刻批判。

《长明灯》着重揭露吃人的封建主义的反动、残酷腐朽和虚弱。作品里，长明灯是封建迷信的旧传统的象征。封建主义势力，把一个要吹